

帝 国 的 迷 津

——近代变局中的知识、人性与爱欲

赵柏田 著

中 华 书 局

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

——代自序

历史正在沦为消费品。

消费历史,正在成为现代人职场打拼和茶余饭后的一道什锦拼盘,由此带来的危险,是在一种乡村教师式的喋喋不休或痞子腔式的解构中,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性和审美的愉悦彻底消解。在这样一个过量消费的时代,诲人不倦的伪启蒙读物和捧哏逗乐的娱乐风稳稳当当地占据着市场排行榜的前位,而“为了让历史学更富有人性”(马克·布洛赫语)、试图擦亮历史之镜的著述反倒更有可能湮灭无闻。

当尘埃落定,历史的魅力会不会因为它在一个时代里曾被当作时尚物品一样来消费而有所逊色呢?显然不会。因为这魅力正来自过往的时间长河里那一张张消逝的面容,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那数不清的人与事,当他们穿过落日的灵棚,都去向哪里?历史中的人与事,呈现在纸上的词与物,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能让我们感受到探幽抉微的喜悦,更能激发起我们被禁锢的想象力?

在自谦为“一个技工的笔记本”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66—1944)吁请世人,“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在这位年鉴学派一代宗师看来,一听到历史具有诗意便惶恐不安,或者以为历史诉诸于情感会有损于理智,都是荒唐和愚蠢的。历史的真实向着诗意的心灵开放,当我在这里开宗明义要为自己的历史叙事方式找到一个合法化的背景时,马克·布洛赫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句告诫一下子跳了出来。

马克·布洛赫已经死了,死于1944年纳粹射出的一颗子弹,也是殉身于他“史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即现实世界保持不断接触”之信念。他那种为了让

历史学更富于人性的努力,至今还在人文知识界产生着恒久的影响。正是他,和其他优秀的历史学家一起,启示我走上了这条沿着人物的内在纹路观照与体察人性的道路;也是他,启示我在回溯历史暗河时不忘倾听人间的消息。我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叙述历史,也是向他这样以求真为职志的历史学家、向历史现场的记录者表达发自内心的敬意的一种方式。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西潮涌入、新旧知识交汇的近百年中国历史,是本书展开的一个背景。这一较长时段,也正是晚清知识界在感时伤世中喊出的“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王韬语)的时代。其时,旧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却早已过了黄金时代。在西方武力撞击之下国门被迫洞开,新旧知识、观念交汇形成的锋面,让无数官员、学者的人生和学术面临着歧路,在巨大的迷茫中无所适从。传统旧学与新知识——所谓“西学”,这两种知识体系并无福柯所说的“相似性”,所以它们不可类推,不会仿效,不会交感,而是在同一个世界间有着清晰的界限。

观念的冲突伴生着痛苦的裂变,这痛是人生之痛,更是家国之痛。本书所涉及的部分人物,如林则徐、徐继畲、王韬、容闳、严复、康有为等,他们穿过时代的永夜,已经沐浴在了新知识的曙光下。他们大多活动于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学界惯于把这些人称作“通商口岸知识分子”),西潮的涌入,由器物而制度而思想,以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的东部中国这片狭长的沿海地带最得风气之先。不过,即便是在新派的阵营,也是不无冲突和分歧。还有一些人物如杨度、李慈铭、段光清等,他们和同时代更多的文人学士在旧文化的框架内度过了大半个人生,传统已经渗入到他们骨髓里,无论思想还是行事都不脱旧文人的格局与习气。

本书试图搭建一个人性与观念史交织的平台,让官员与学者、传教士与海盗、思想家与冬烘先生、维新人士与保守派大员悉数登场,在现代性与传统、道德与人性之间角力争逐,呈现出一帧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浮世绘。

考察本书所述十余位主要人物的生平,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中叶,跨度一百余年,他们中大半是官员兼学者,个别以布衣终身,都以自己的方式或深或浅地介入了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和官场。因此本书也在一个侧面上,触及了晚清以来官僚政治中人性的一面:这些官员(学者)的长处和弱点,他们面对新事物的疑惧与不安,他们个性的怪诞与乖张,他们之间的思想争锋与利益争斗,以及他们对这世界从幼稚到成熟的描述。他们中最优秀的一些人,已经堪称那个时

代的思想精英。诚然,在近代中国做一个思想家,首先意味着要有承受失败的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些先觉者就像一个个与巨人赛跑而注定失败的人,他们大声呼告着,要告诉那个巨人前方何处是悬崖,何处是坦途,但他们的声音总也追不上那个踉跄着前进的巨人。

本书描绘的这些个案,或许正好印证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迷津:急剧的政治变革往往超越时代思想,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建构几乎很少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中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导;任何思想家都很难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始终引领着时代潮流,执思想界之牛耳。如同春天的气候一般多变的近代中国时局,使得很少有几位思想家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原有思想并构成严密的体系,以加速度行进的时代导致了思想家们一个一个地落伍(这一观点,亦可参见马勇先生的《严复学术思想评传》一书)。他们的思想就像一支支不失锋利的箭簇,铆足了劲离弦飞去,却总是脱靶。有几次看似已经命中了近代中国的软肋,但巨人不知如何一转身,那箭还是轻轻滑过,飞驰着,落入历史和时间无穷的幽深处。

可悲可叹就在于,后来的世代里,当中国的奔跑获得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时,后起的一群人丢弃他们的前辈就像丢弃一个个恶梦的影子。

在近代中国,政治向来是政客和野心家谋求权力、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舞台,而不是公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因此凸现出一个极大的矛盾:要改革的没有权力,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又不会主动、积极去改革,结果会酿成大众共同参与的暴力,最终可能形成暴政与推翻暴政的历史循环。现代性之于中国,是一个多么漫长、曲折、艰难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迷津依然是现在时。

本书同时试图把这些人和事放到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进行考察。套用特里·伊格尔顿的一个说法,爱欲以及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正可以投合知识分子追索复杂性的激情,它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铰接点”。尽管,历史阐述从社会、政治史向身体学的转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就已初露端倪,但在中国,这种把大脑与感官结合起来的叙事,对早已习惯一元史论的读者的阅读神经还是不无挑战意味。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的足迹和心迹可用一个词概括之——大幅度后撤:从生活世界到文字世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对当下生活的描摹到历史书写,从文学走到学术边缘。当退无可退,无所依傍,也是我在绝地里完成新一轮

空翻的时候了。

窗外,寒冬夜行人正吹着轻快的口哨经过。新年凌晨的钟声即将敲响,新事物的气息弥漫而至。我俯首谛听内心渗出一丝声音,这声音渐趋宏大,又消融于无边的夜色。

我从历史的边缘经过,我以叙述为生活。

2007 年 12 月 31 日

迷津

——林则徐与徐继畲的一次交锋

一 还乡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一个被疟气病和头晕病折磨已久的老人离开昆明,踏上了东归故乡之路。此人就是刚刚卸任云贵总督、奏请开缺回乡调治的林则徐。岁在己酉的1849年,林则徐六十五岁,在官场驰驱了大半辈子的他已是力疲心瘁。尤其是近十年来,从遣戍新疆伊犁,到重新起用后驻节于多事的陕甘、云贵,衰惫之躯已越来越让他有力不从心之感。

去北京,还是回老家福州?动身前,林则徐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任职北京的女婿沈葆楨竭力促成退休的老丈人进京居住。林则徐早先亦有此意,曾委托京中老友代为觅屋,但京城官场繁重的应酬让他一想起来脑袋就发怵。不出门吧,恐怕引起招怪;出去应酬吧,又与告病名实不符,万一哪个小人背后射来一箭,尤为不值。更让他担心的还是北京寒冷的冬天。这几年一直在南方过冬,从来不用穿什么大毛衣服,万一不适应京城如许寒冷的气候,旧疾转重,那真要把一把老骨头扔在皇城根下了。

但是,故乡福州也并非宁静的乐土。二十年不履故土,林则徐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文藻山背后倾圮的老屋和庭院里疯长的荒草。几亩薄田,外加几间东倒西歪屋,使他归来事农圃的田园生活设想也会在事实上成为一个泡影。从云南昆明刚启程至曲靖,在写给女婿沈葆楨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能否在故乡长住表示出忧虑。这一忧虑随着家乡的逼近越来越困扰着他。扶病东归至南昌,林则徐在百花洲淹留了四十余天。固然是旅途过于劳顿,他要觅医诊治,但在一封写给朋友

的信里,他流露了近乡情更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往,尚未可知。

卧榻之侧何人,让林则徐一提起来就耿耿于怀?

他的故乡福州城,已在 1844 年的夏天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向西方世界开放。1845 年 1 月,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争得他的领事馆人员入住福州城内乌山积翠寺。从家乡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此事时,林则徐已在署理陕甘总督任上,此事曾引起他的忧虑与警觉。一个宦游在外的人,怎忍心看着故乡成为一个“腥臊之窟”?那时他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慨叹:“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彼时距 1840 年的那场中英之战才过去四五个年头,作为这一改变近代中国进程的事件的主角之一,林则徐已经深感历史的吊诡了。

自道光二十九年 (1849) 十月下旬动身,至道光三十年 (1850) 四月,林则徐终于抵达想回又不忍回的故乡福州。从昆明到福州,这一程路他走了近半年。姑且不论交通的不便和身体上的原因,他实在是走得过于慢了一些。

自道光十年 (1830) 离开福州,二十年过去了。文藻山的房屋久未修葺,也少人打理,再加临着穿城而过的闽江的一条支流,地势低洼,汛期发大水时留在梁柱上的水线还宛然可辨。欲行另购房屋,却又力不从心,他多年行走官场,但没攒下什么钱。林则徐把住宅第三井的双层楼房稍作收拾,就住了进去,这就是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楼上是他的藏书室兼工作室“云左山房”。

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现在有时间去回忆自己并不宁静的一生了。从京城的翰林院,到武昌,到广州,再至遣戍西北,这就是他的官场之路。人生就像一个白痴画的并不太圆的圈,他现在又回到了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这座多雨的南方城市。他读书,写作,整理宦居各地时写下的诗篇,日子过得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但病痛袭来时遮天蔽日的黑暗却时时挑战着他的意志力。有时,他不无悲观地觉得真的熬不下去了。这一时期往来信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形象:

力疾返里，委顿难支，破屋本在省垣，只得复仍其旧，摒挡一切，深觉累身。

喘咳、气逆及鼻衄诸疾，较前瘥减，惟疝气下坠，不独拜跪之难，并行坐亦不能自适，时时作痛。

但比身体的疼痛更甚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这撞击他内心的痛，至死都未能平息。

二 从内陆到沿海

1850年，驻节福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帝国的著名能吏徐继畲。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返回福建出任福建巡抚并兼办通商事务。道咸年间的帝国政坛，这般朝令夕改的事情并不只是落在徐继畲一人身上。按帝国官制，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都驻节福州城，但这一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由徐继畲代理总督职务，他成了福州城甚至闽、浙两省事实上的一把手。

现在，他的官帽上沿缀着一颗红珊瑚，官服的前胸后背都绣着锦雉。作为全国十五名巡抚之一，他的级别是从二品，上司的缺席使他兼署闽浙总督一职，同时他还兼任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等职，以便更好地做好节制军务、考核群吏、监督乡试、代表朝廷管理地方上的财政税收，以及时人视之为畏途的办理通商事务等工作。

这个学者型的官员 1795 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有着浓郁书香的缙绅之家。在帝国官场上，徐继畲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应该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在博学的父亲的指导下，还是幼年的他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训练，尽管十九岁中举后，伴着青春期的闷骚他度过了十三年苦闷的时光，但 1826 年的会试及第，及后来朝考中名列第一的辉煌经历，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场的宠儿。经皇帝召见，他荣幸地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国家的最高学府继续他的学业，并在不久后晋升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在 1826 年进翰林院之前,徐继畲在他的山西老家度过了人生的头三十年。关于山西,不错,它确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是“一个巨大的堡垒” :高高的黄土地、岩体坚硬的群山、河谷、陡峭的崖壁,这一切构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它无疑应该划入到费正清博士所说的“内陆中国”里去。在接下来的混乱年代,这些地理和文化的屏障使得传统中国在这里保留下了最好的样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徐继畲生活的十九世纪,使得这个内陆省份闻名遐迩的,还有执当时国内金融之牛耳的山西票号和赶着骆驼走南闯北的山西帮商人。徐继畲的老家在五台山南麓的一片丘陵地带,在这里,青年时代的徐继畲肯定目睹过汾河岸边的商业中心喧闹繁忙的景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当他后来有机会到东部沿海任职时,这一切都将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翰林院呆了十年后,这位年轻的官员踏上了帝国官场的晋升阶梯。此后他辗转于多个职位并获得快速的升迁,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到广西浔州知府、延津绍道台、汀漳龙道代理道台、福建粮台、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直到 1846 年出任福建巡抚一职,从翰林院出来不到十年,他的级别由从五品升至从二品,连升六级,成为帝国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当他跻身于高级官场这一变化莫测的环境中时,他的升迁有时连他的家人也难以置信,因为有时才隔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得到提拔。他在沿海地区的发迹无疑得益于翰林院十年打下的社会关系,这在道光年间的政坛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众所周知,他与道光皇帝童年时代的好友、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族大臣穆彰阿有着密切的来往。当然,作为一个善于处理海疆事务的“夷务”专家、一个颇具才略的行政官员,徐继畲得到北京方面实权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最初来到福建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当时沿海形势吃紧,战争一触即发,徐继畲从广西调任延津绍道,管辖闽江上游地区,后又奉命兼署汀漳龙道,驻守漳州。应该指出的是,就在他到达闽南沿海时,一支英国远征军也抵达了中国东海岸。这支舰队由英国人乔治·懿律率领,以“鳄鱼”号为旗舰,在北上天津的途中,封锁厦门,炮击定海,直如摧枯拉朽,并最终迫使道光皇帝完全转变了对英国的强硬立场。

道光二十一年(1841),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构筑的厦门防线失陷,四百多门火炮和六七千精兵没有抵挡住三十余艘英国军舰的进攻。此时,徐继畲奉令死守

漳州。目睹英国人攻陷厦门,这个博学的中国官员如此写道:“寝食不遑,心力交瘁”,“逆夷叵测”。对他来说,冥顽不化的西方人实在是一个谜,他们强大的武力也让他感到惊奇。朝廷卷入这场无望的战争,在务实的他看来实在是愚不可及。在战败后写给山西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称英国人是“红毛”中最强大的种族,生活在距中国七万里远的地方,侵占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其船坚固庞大,其炮猛烈,其海军相当强大,并称“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

或许是北京强硬的后台起了作用,战败并没有让徐继畲丢官,相反,他在第二年五月被提升为广东按察使,接着又任广东布政使,并于同年九月再度回到福建出任布政使一职,成为该省的三把手,奉命移驻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

他与天朝帝国之外的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了解,当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开始与西方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医生、领事、商人和海员。他还多次和被他称为“西土淹博之士”的美国传教士兼旅行家雅裨理进行对话。徐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西方地理文献,并自制了部分地图。雅裨理称这个钦派专员是自己见过的中国官员中“最爱寻根问底的”,“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与徐继畲有着良好关系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员还有李太郭、高民、阿礼国等人。无疑,这些人对徐继畲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徐也在与他们的交涉中表现出他的才干,抬高了他在清朝官场中的身价。

令人吃惊的是,在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后,这个精干的官员于政务之余在厦门写出了三万余字的《瀛环考略》,并在多次增删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定名为《瀛环志略》付印出版。全书共十卷,十四余万字,四十二幅地图。此书几乎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沪上名士王韬读到这本书后,把它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并列,誉之“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慨叹徐继畲“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二十年后的《纽约时报》甚至如此评论:“中国历史悠久的整个地理学体系,被这位东方的伽利略改革了。”

徐继畲在序文中略叙了成书的经过：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昭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

《瀛环志略》最终成书，除参酌了历朝正史和兵家地理等中国文献记录、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著作外，还直接以与西人的访谈和口述为资料，徐继畲这样自述：

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所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他对世界地理和形势的了解，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一位 1845—1846 年间在福州访问的美国人史密斯这样记述道：“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上，这位督抚（徐继畲）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在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满了中文名称。”

《瀛环志略》在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间，一直是国人了解世界地理最受器重的著作，对帮助国人确立世界图景实在是功莫大焉。据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统计，

这部著作起码影响了以下诸人：魏源、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曾国藩、康有为和梁启超。魏源的《海国图志》由六十卷增补至一百卷时，曾从这本书中辑录了四万余字。1876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使西途中每到一处便取出随身携带的《瀛环志略》，与当地情形相对照。出使西方四国的薛福成，更视此书为了解西方世界之津梁，并有心为之编撰续集。梁启超1890年乡试落第，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此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后来他这样谈及此书影响：“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直至戊戌变法时期，这本书还是在知识界最受欢迎的西学读物之一。

由于职务变动的缘故，徐继畲开始面向大海，而正是从海上吹来的新思想的清风，使得他的内心深处起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他不惜以个人遭受谴责为代价引进西方知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徐继畲后来因乌山事件罢官，虽说是政局变动之故，更有士大夫非议乃他思想上“不忠”所致）。据德雷克的研究，这种良知来源于清代的三种重要思潮：第一，作为经世致用学派的拥护者，他强调高效能的政策对于巩固国家的重要性；第二，作为对广泛收集的信息持必须进行估价和严格审查态度的经验论者，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从什么来源，收集有用事实的重要性；第三，作为王阳明学说的忠实信徒，他坚定信仰着知行合一的理论。

这个从来没有海上生活经历的北方人来到沿海地区，一下子使自己置身于弥漫着湿热暑气和灾害性台风袭击的亚热带，开始时肯定有过某种生理上的不适。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并适应了这一气候，包括如同东南沿海台风天气一般多变的政治气候。不幸的是，他的妻子从山西来到此地后终因水土不服于1846年永远地离开了他。徐妻作为一个官妇于1843年甫抵福州城，一来就“畏寒，畏暑，畏风，时时作患”，她总想回山西老家，但徐不愿让她独自回去，他说服妻子留了下来，并答应她安排好引退事宜后一起回老家。1846年从天象上说是个灾异之年，春夏之交淫雨绵绵，一连下了近三个月，可一抵六月之末，突然酷暑难当，本就不服水土的徐妻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这一悲伤曾经像刀子一样锐利地刺痛着他，但官场上的得意（他升任福建巡抚也在这一年）肯定缓释了这一伤痛并让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政务。由于福建沿海多山，陆上交通困难，从驻防的厦门到省城福州，他常走水路。这一沿着海岸线的途程是厦门、福州直线距离的整整十倍。徐继畲乘船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

往返,沿途形成的一个个优良港湾,数以百计的海上小岛(其中不少是海盗的理想避风地),用来捕鱼和贸易的舢板,以及生气勃勃的海上贸易场景,无疑都映入了这个北方人好奇的眼里。

福州的生活也同样强烈地吸引着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员。如果没有战争,那真是个好养性情的地方:春天,捕鱼的鸬鹚跃入闽江,精美的“花船”泊于江边,如同一幅水汽淋漓的中国水墨画。到了盛夏,水牛在泥淖里打滚,以消减闷热的暑气,官员们也带着他们的家眷远离熙攘喧嚣的闹市,来到恬静的山水田园中。这座历史悠久、有着六十多万居民的古城,处于风光秀丽的闽江的环抱之中,江岸峭壁林立,稻田层层。狭窄的河流穿越崎岖的内陆山区,为福建内地发展贸易提供了水道。沿江两岸,有生长茂密森林的群山、藏匿猛虎的巢穴和景色如画的寺庙。在福州的货场,从闽江上游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同时这座古城还以出产精美的漆器和各种竹制器具驰名中外。在富有南国情调的大街上,如同《清明上河图》里所描述的一般,汇聚着画匠、灯匠、裁缝、金银箔匠、伞匠、弹棉花匠、杂货商、药商、玉匠、图章雕刻师,以及室内装饰师开设的家家店铺。

然而,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徐巡抚也有他的苦恼。由于对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存在不同理解,英国人屡次要求入城居住,而城里的士绅官民对之又抱着强烈的敌视态度。如何安抚民众情绪,又不开罪洋人以致酿成冲突,徐巡抚担当着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一想到这个棘手问题就头疼不已。

三 乌山之争

地处福州城西南角的乌山(乌石山)是城内的一处名胜,山高不足百米,却也林壑幽静,风光佳美。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此山秀色直可比拟海外的仙山蓬莱、瀛洲,而朱子祠、九贤祠等历代建筑又使它成了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文脉的一个象征。

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一桩突发的事件惊破了这里出世般的宁静,而林则徐和徐继畲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这座小山。

这年六月,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通过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ell)租赁了乌山神光寺的几间房屋,租期为六个月。由

于不习条约条款，侯官县令兴廉在租约上盖了官印。徐继畲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加申斥，并飭令其设法劝说英人搬出神光寺。但是，金执尔以此事需经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由予以拖延。

此事引起了林则徐及城内部分士绅的不满，激烈的情绪开始蔓延。不几天，绅士们发出一封“致英吉利夷官公信”。福州城内书院的学生也在鼓动之下提出抗议。林则徐还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畲，声称“现居桑梓，利害切身，事关省会安危，亦不敢始终缄默”，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众所周知，由于对《南京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英文解释间存在着分歧，五个通商口岸城市是否允许外国人自由居住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民众多有抵触情绪，而以广州为最，直至发展到市民自发以武力行动驱逐入城英人。

徐继畲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他认为，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外交手段，从容处理，使英人自行搬出，以免扩大事态。而林则徐认为，这样做太过软蛋松包，应像广州拒绝英人入城那样，采取断然措施，并主张成立民团，防止英国人的军事威胁。他在上书中一连提出十二个问题质问当局，并情绪激昂地表示，如果战事不可避免，年老又多病的他也在所不辞地挺身而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

为避免酿成更大冲突，徐继畲派出士兵在神光寺巡防，这更激起了士绅们的不满。“夷性犬羊”，官府干嘛还这么护着他们？

按照帝国官场不成文的惯例，致仕官员是不可干涉地方政务的。干政就要冒剥夺荣誉、官衔的风险，但林则徐豁出去了，他不仅带领福州城里的士绅们闹事，还秘密联络在京闽籍言官上奏，要他们弹劾刘韵珂和徐继畲，终于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大案。

时局的动荡使朝廷又有了起用林则徐之意。七月初，借一次传旨的机会，徐继畲表示想到林宅看望林则徐。徐继畲的这一举动自然不无彼此沟通、修复前嫌的意图，但林则徐以疝气未痊为由婉拒了。这两个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人物，终于失去了一次对话的机会。

八月，在遥远的京城，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向咸丰皇帝上奏，陈述诸绅士的观点，对徐继畲和刘韵珂发起了攻击。同日，奉上谕颁发了一项敕令，向军机处通报了有关外国人试图入福州居住的报告。皇帝指示，刘韵珂、徐继畲务要实现“总

期民夷两安”，看似是简单的一句话，实际操作起来却难如登天。

徐继畲的上司、闽浙总督刘韵珂从外地阅兵回来，知悉事情经过，认为林则徐等人的做法实在过于激烈。这个在夷务问题上惯使阴招的总督大人想出了一个妙法：住在城里的不就是一个医生一个传教士吗？那就不让百姓去听教、看病，不要让房主去收租金，雨季到了，也不要让工匠们去修葺房屋。这般不露痕迹地施加压力，时日一久，洋人必会像过了汛期的洪水一般自动退走。他把这一妙法称之为“藉民拒夷”。

总督大人这一背后下绊子的“抗夷妙法”，在以往可说是屡试不爽。福州的通商口岸是 1844 年夏天向西方人开放的，但在刘韵珂的主政下，福州名为开放口岸，实与闭关无异。刘韵珂的暗中部署有二：一，英商不是看中武夷山的茶叶吗？那就派兵设卡，多多刁难，让茶商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就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交易。最先遭殃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到福州停泊一月，做不成一笔生意，带着满脑子黄金梦来到东方的山姆大叔们把带来的商品抛价销售也无人问津。更绝的是，为了早日送客，总督大人又让城内商人购买少许商品，以作洋人回老家的盘缠。总督大人的阴损招数收到了预期效果，开埠第二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三十七万元，而接下来的 1846、1847 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如此之差的生意，令英国人曾打算舍弃福州，考虑要温州开埠。英国的外交官们一直都没有看出这位笑咪咪的一品大员暗中有在做手脚，行阻挠钳制之术。据说，总督大人的这一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和密片，正折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密片则在皇帝那里留中不发，惟一得悉内情者惟心腹徐继畲（时任福建布政使）一人。

在对待令人头痛的英人入城问题上，总督大人也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谋术。虽然中英双方对《南京条约》里英人入城问题的解释存在分歧，但在领事官入城问题上应是没有争议的。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初至，刘就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把他们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因领事馆的房屋实在过于简陋破败，且在这座潮湿的城市里一逢雨天就漏个不止，英国驻华公使再提领事入城的问题。刘韵珂勉强同意，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靠城墙人迹罕至的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操之我手。在给道光皇帝的密片中，刘韵珂的这一番表白让皇帝十分欣赏：

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

1850年即位的咸丰皇帝,在外交事务上一改道光时代的软弱,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强硬态度,刘韵珂的秘术开始行不通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是堂皇的胜利,而不是暗底下使绊子得来的小便宜,对刘的申斥也就越来越严厉,在廷寄中一次次要求刘、徐断然采取措施。当时士林,人们更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直接的对抗,对刘表面上的“媚夷”十分反感,而对他暗地下绊子的“制夷手法”又毫不知情。刘韵珂落了个两面都不讨好。

多次受到皇帝的责怪,刘韵珂坐不住了,老谋持重的他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结局,于年底借前往浙江阅兵之际,称病请求给假。咸丰看穿了他的把戏,准其开缺,“回籍调理”,由徐继畲代署总督。整个咸丰一朝,刘韵珂都默默无闻,直到咸丰死后,他才应召赴京以三品京堂候补,未几病死。

林则徐也坐不住了,六十六岁且又久病的他,雇了一条小船,沿着闽江一路视察两岸的形势,一直走到入海口。在考察福州海防后他写出了一个详尽的报告递交官府。在报告中,他建议在闽江口修建和加固马尾的北岸炮台、南般炮台,连江的长门炮台和琅岐的金牌炮台。

这年八月,林则徐的本家侄辈、诗人林昌彝回到了故乡福州。他的老家就在乌山脚下,从他家的楼上就可以看到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他称之为“英逆之窟穴”。林昌彝把楼名取名“射鹰”,谐音“射英”,楼上客厅里还挂着一幅《射鹰驱狼图》,并以一副楹联自述心志: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林则徐十分赏识此人,称他这幅图真是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在一种假想的英雄主义情怀的激励下,林则徐和林昌彝等一千人成天谋划着如何将“英夷”驱逐出城。林则徐在写给外甥和女婿沈葆楨的信中略叙了此间发生的事情经过,遭受“猜嫌”,“焦心劳神”,并担心当局会由于他“夷务议论未合”而截留信件:

幼丹吾甥如晤:……兹九月初二接七月廿五日一书,初六又接八月初四日一书,暨前后所寄邸报,俱已收阅无误。其七月初寄去信内未将端节来函提及,只是漏叙,并非原信遗延。盖彼时与当轴尚少猜嫌,不至被其匿信。迨

六、七月来为夷务议论未合，难免虑此。此次初六所接之信附入安报中来，最可免人猜忌。惟内有京报，恐封缄加厚，或另匀作第二封，别写酒资，俟府间代付之后，愚仍划还；抑或与冰如互商，两边自寄，均可酌量耳。……此间居家情形一言难尽，而出去又有不能之势，焦心劳神转较在滇为甚，不知如何可了。近事另缮数纸，封入冰如信中，自能转述，兹不复及。都中闻见仍欲时时得之为妙。手此顺问近佳暨合宅均吉。九月初六夜灯下。

仍然倔强地支撑着局面的徐继畲，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外人看来处变不惊的他，在一封写给堂兄的家书中流露了内心的苦恼：

弟畲稟请哥哥大人安！八月间折差晋京，寄书一函，未稔于何时可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令兴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后，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声势凶凶，几致酿成大事。弟以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后，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夷人公后，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复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囑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句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为抚驭无方，继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徇庇汉奸。现已一一复奏，尚未知旨意如何？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疾。

林对当局抱不信任态度，徐则把乌山神光寺事件归咎于林“意在沽名，急欲驱